



中央民族大学“985”、“211”工程项目成果
青年学者论丛

ZIBEN ZHILI YU
ZHENGZHI ZHUANXING
DONGYA DIQU MINZHUHUA BIJIAO YANJIU

资本治理与政治转型 ——东亚地区民主化比较研究

傅景亮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013059382

中央民族大学“985”、“211”工程
青年学者论丛

D731.02
03

ZIBEN ZHILI YU
ZHENGZHI ZHUANXING
DONGYA DIQU MINZHUHUA BIJIAO-YANJIU

资本治理与政治转型

——东亚地区民主化比较研究

傅景亮 / 著



北航

C1666041

D731.02
03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治理与政治转型/傅景亮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660 - 0397 - 3

I. ①资… II. ①…傅 III. ①资本管理—影响—政治制度—研究—东亚 IV. ①D73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3383 号

资本治理与政治转型

作 者 傅景亮

责任编辑 杨爱新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 数 41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397 - 3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问题意识和基本观点	(1)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3)
三、政治转型:概念、内容与过程	(11)
四、政治转型的比较研究与范式	(15)
五、基本框架和内容介绍	(23)
第二章 从土地到资本:历史的叙述与比较	(26)
第一节 土地与土地政治	(26)
一、土地政治的利益基础	(27)
二、土地政治的权力关系	(28)
三、土地政治的制度形态	(29)
第二节 资本与资本政治	(30)
一、资本:一个科学的范畴	(30)
二、资本政治的逻辑	(32)
第三节 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	(40)
一、治理模式的经济基础	(41)
二、治理模式的规则结构	(42)
三、治理模式的功能目标	(43)
四、治理模式的价值取向	(45)
五、治理模式的中间机制	(47)
第四节 转型的路径:土地改革	(48)
一、土地改革与资本治理	(48)
二、东亚土地改革的案例	(50)
三、土地改革、资本治理与政治转型	(56)
第五节 东西方资本治理模式之比较	(58)
一、历史逻辑的差异	(59)
二、资本文化的分歧	(64)

三、资本治理制度化程度	(67)
第三章 政治整合危机与资本治理	(69)
第一节 殖民经历、整合危机与资本治理	(70)
一、殖民经历的异同	(70)
二、殖民地资本结构及其政治形态	(73)
第二节 身份、认同危机与资本治理	(75)
一、族群生存危机与身份意识	(76)
二、主体族群、少数族群与资本治理	(82)
三、外来族群、本地族群与资本治理	(84)
四、资本地域、规模差异与威权体制	(93)
第三节 功绩、领导危机与资本治理	(95)
一、传统精英与现代精英的转换	(96)
二、互惠价值与功绩理念的转换	(97)
三、权力分散与权力集中的转换	(99)
四、竞争、发展与资本治理	(101)
第四章 东亚威权体制:基于政治经济的分析	(103)
第一节 中国台湾地区:一党威权体制	(104)
一、国民党的成立及其在大陆的执政	(104)
二、国民党改造运动和威权体制的建立	(105)
三、中国台湾地区威权体制的特征	(108)
第二节 韩国:官僚威权体制	(109)
一、传统威权体制的复原	(109)
二、短暂的民主政治实验	(110)
三、军人政权及其转向	(111)
四、维新体制与官僚威权体制的确立	(113)
五、韩国官僚威权体制的特征	(114)
第三节 泰国:军人威权体制	(115)
一、军人威权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115)
二、军人威权体制特征及原因	(119)
第四节 菲律宾:家产制威权体制	(121)
一、民主体制的运作	(121)
二、威权政治的展开	(123)
三、家产制威权体制	(125)
第五节 东亚威权体制的总体论断	(127)

一、传统与现代的链接	(127)
二、威权体制与现代国家建设	(131)
三、比较的视野	(134)
第五章 资本治理政策变迁和基本模式	(136)
第一节 东亚工业化战略与资本治理	(136)
一、工业化、资本积累与资本治理	(136)
二、东亚工业化的案例比较	(138)
三、工业化、资本治理与民主化	(147)
第二节 东亚威权型资本治理模式	(148)
一、中国台湾地区：党治—混合型资本治理	(148)
二、韩国：官僚—财阀型资本治理	(151)
三、泰国：军人—庇护型资本治理	(154)
四、菲律宾：亲友型资本治理	(155)
第六章 资本治理的制度形态及其张力	(158)
第一节 资本治理的制度化	(158)
一、制度化理论与资本治理	(159)
二、资本治理的制度管道	(162)
三、资本治理制度化的内在张力	(170)
第二节 资本治理、威权体制与庇护主义	(172)
一、作为中观理论的庇护主义	(172)
二、资本治理中的庇护主义	(174)
三、庇护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	(180)
第七章 资本治理的结构形态及其张力	(183)
第一节 资本、劳工与威权政府	(183)
一、法团主义的视角	(183)
二、法团主义：一种中观理论	(184)
三、资本社团与威权政府	(186)
三、工会与威权政府	(193)
四、走向社会法团主义	(196)
第二节 外国资本、民族资本与威权政府	(199)
一、经济上的依附与自主	(199)
二、主体间的合作与冲突	(203)
三、三者结构性张力	(208)

第八章 资本治理与威权体制的危机	(211)
第一节 资本治理张力的变化	(211)
一、资本治理张力的二元性	(211)
二、资本治理张力的失衡	(215)
第二节 资本逻辑、威权逻辑与发展逻辑	(219)
一、资本理性与资本逻辑	(219)
二、权力规则与威权逻辑	(221)
三、现代化与发展逻辑	(223)
第三节 资本治理与威权体制危机的临界点	(225)
第九章 资本治理、威权体制与政治转型	(229)
第一节 资本治理与民主化的肇因	(229)
一、民主化的一般动因	(229)
二、资本治理的作用	(232)
三、资本治理与民主选择	(235)
第二节 威权体制的政治转型	(236)
一、制度民主化	(236)
二、结构理性化	(240)
三、市场自由化	(243)
四、资本精英的战略选择	(244)
第三节 走向资本主导政治?	(246)
一、资本治理权力重心的转向	(246)
二、对民主巩固的意义	(247)
三、治理资本	(249)
四、余 论	(251)
第十章 资本治理与公共政治:中国案例	(254)
第一节 资本成长的政治经济分析	(254)
一、公私兼顾的过渡时期	(255)
二、国有资本的绝对地位	(258)
三、边缘—中心的改革之路	(264)
四、混合资本的发展阶段	(271)
第二节 混合型资本的治理结构	(276)
一、互补—人情—关系型治理	(276)
二、合作—权威—政策型治理	(279)

三、竞争—契约—制度型治理	(282)
第三节 资本治理与社会公共政治的转型	(284)
一、社会公共政治转型态势及其问题	(285)
二、资本治理与社会公共政治的难解之题	(288)
三、宪政民主与资本治理	(291)
参考文献	(295)
后 记	(309)

第一章 绪 论

一、问题意识和基本观点

历史如镜，人们总是试图在他者的形象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尽管历史有着太多的相似性，但是差异似乎更能表明事物的身份。东西方的比较即呈现为此种状态：即使外在的貌似亦遮不住内在的差别。东亚^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普遍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而在政治形态上辅之以“西方式”的民主体制，这样一种经济政治的制度安排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西方现代国家的建构逻辑，但令人遗憾的是民主的“外衣”被威权统治者所利用，而按照西方传统理论所设想的符合民主制度的资本经济体制却和威权统治“勾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威权型资本政治治理^②模式。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风起云涌，东亚威权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开始向民主体制转型，在此现实场域中资本治理与政治转型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呢？此为本书的基本设问之一。

一般来说，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生成和发展主要仰赖于威权体制的扶持，资本在威权体制的庇护下获得了巨大收益，反过来，资本所提供的物质关系意义又构成威权体制关键性的支持要素。从此逻辑看，威权体制的民主转型必然影响资本与政治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必然损害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资本因而会捍卫威权体制而阻碍民主转型的进程。很多关于民主转型的文献基本上都认为，商业和商业精英惧怕民主转型，特别是民主转型意味着劳工的动员以及要求约束并限制威权体制。^③事实果真如此吗？换言之，理论推演与现实场域的转换符合东亚地区政治转

① 本书中的东亚地区是指欧亚大陆太平洋西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大陆东部的大陆、半岛和海岛，从广义上讲泛指中国内地、中国台湾省、韩国、朝鲜、中国香港、东盟等为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其中韩国、泰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为本书比较研究对象。

② 本文采纳俞可平对治理概念的界定，即“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因而，治理是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使用，本文的“资本治理”即资本政治治理，下文一概统称“资本治理”。

③ Linz, Juan “Foreword”, in *Business and Democracy in Spain*, by Robert Martinez,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3.

型的真实进程吗？政治作为集体行动的时空结构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东亚地区的资本治理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复杂而深刻，进而言之，东亚地区的资本治理在民主转型中发挥何种作用要取决于诸多因素。到底哪些基本因素在发挥作用呢？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作用于资本治理的呢？此为本书的基本设问之二。

资本成长和发展不是在真空环境中我行我素的，必然经受外在主体力量和制度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资本治理中既存在市场的内部规约，又存在社会的客观需求，还需要政治的制度权威。此乃由于资本治理在现代国家和社会构建中的作用使然，其对于市场建设、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而言，确实是“权威的价值分配物”。围绕资本治理而来的辩护、反对、批判、支持的声音经久不息、不绝于耳。资本治理俨然构成了现代政治中无可回避却存在严重的理论分歧和现实差异的治理内容。因国家或地区之关系、政策和制度迥异，资本治理模式也千差万别，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对政治形态和资本治理之“分”、“合”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梳理，观察其变迁的历史轨迹，探讨其变化可能带来之结果，即资本治理的制度变迁是否会影响东亚地区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呢？此为本书的基本设问之三。

问题意识指向资本治理的制度变迁及其对威权体制政治转型之影响，我们从这里出发开始探索之旅，去尝试性地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在东亚地区，资本治理可以追溯至土地政治治理之衰微，从土地政治到资本政治，开启了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也为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预设了条件。此是本书之分观点 A。在东亚地区，资本政治治理替代土地政治治理的过程并非一个主动和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因西方殖民化打断并被迫接受的过程。资本治理的此种特征亦会对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影响深远。此是本书之分观点 B。在东亚地区，为应对现代化的挑战需要构建既能够汲取传统权威资源，又能够整合现代社会基本需求的政治体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威权体制，威权体制成为资本政治治理的关键矢量，威权体制政治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资本政治治理的模式，此种模式的固化状态又直接影响到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此为本书之分观点 C。在东亚地区，威权体制为促进本国或地区经济之发展、权威之合法、对外之独立、人民之福利，必须进行工业化建设。选择何种工业发展战略对于威权体制至关重要，不仅影响其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关乎经济战略之转型，从而对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形成重要影响。此为本书之分观点 D。在东亚地区，威权体制下的资本治理在制度化层面表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张力，由此导致资本治理的制度化危机，又进而导致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此是本书之分观点 E。在东亚地区，资本力量涉及市场、社会和政治不同面向，因而在资本治理结构中必须通盘考虑各种要素，包括资本与劳工、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等关系，这些关系在威权体制的控制下获得了一时风平浪静，但是其中存在的紧张关系并不能根除，必然会影响到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因而为威权体制之民主政治转型创造了结构性条件。此是本书之分观点 F。由于上述 A、B、C、D、E、F 六个变量之相互作

用,使得东亚地区的威权体制普遍面临合法性危机,最终导致资本逻辑、发展逻辑和威权逻辑之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从而为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提供了条件。此乃本书的核心观点。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政治转型过程异常复杂,却又存在诸多共同之处,如制度之民主化、结构之理性化、市场之自由化,而在历史节点上精英的政治选择也发挥了异常罕见的作用。当然,随着民主转型的成功,政治主导资本的时代似乎终结了,而资本主导政治的时代对于民主巩固却可能带来更为根本的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欧债危机,或许都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资本治理模式对于民主的意义和作用。^①由此说明,资本治理与政治转型的分析具有极强的现实场域,是现代国家和地区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能忽略的一个核心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内研究

国内关于威权体制下资本治理与民主转型的相关研究颇为零散,主要见于少数文章和著作之中。如李路曲在分析东亚国家政治转型时指出:“东亚各国政府采取的国家主义的工业化政策要求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政治和经济的国家合作主义的体制模式作为保障。在这种模式中,几乎没有给资本留下自治的空间。个人参与者对国家的依赖,使结构主义理论所设想的那些独立利益一时很难发展起来。然而,自80年代以来,正在变化的国际国内情况,削弱了这种体制的安排,增加了资本的自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民主正在通过国家和资本之间的相互协商和妥协来发展。”^②国家与资本的合作主义对于东亚地区民主转型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取向具有深层次影响,但是合作主义是如何具体展开并对民主转型产生何种作用,作者没有进一步论述。郭定平在《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一书中也注意到资本力量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③至于这种作用的丰富内涵和历史意义则并未涉及。施雪华较早提出了“资本政治”的概念,但其研究视阈定位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从土地政治转变为资本政治过程中民主形式之变化,^④至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政治

① 牛津大学斯坦·瑞根教授于2012年5月13日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作“欧债危机与民主政治”的专题讲座,他认为“欧债危机”并非民主政治所导致,而是特定国家政府治理不善,尤其是国家债务、社会福利等政策失当造成的。参见: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2-05/16/content_241228.htm。燕继荣教授则认为,民主政治的平民化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政治根源。参阅燕继荣:《对民主政治平民化的反思——欧债危机的启示》,载《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7期。探讨欧债危机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皆可从资本治理入手去反思民主政治,从二者关系中分析问题之根源。

② 李路曲:《论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及其特色》,载《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施雪华:《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与民主形式是否与早期工业国家类似则未触及。倪炎元在《东亚威权政体之转型：比较台湾与南韩的民主化历程》一书中认为：工业化的升级与资本积累皆为威权体制酿成的结果，而非其产生根因。在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民主化演进过程中，大资本的作用非常有限，主要是中小资本扮演重要的民主转型角色。^①另一位台湾地区的学者王振寰则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其中就包括政府与资本之间的联盟渐趋瓦解，国民党不断面临本地资本“投资罢工”的危机和挑战，资本构成了台湾政治转型中社会反抗的力量之一。^②中国的学者业已察觉到资本在民主转型中因其社会力量之重要由被动转向主动，但是，知识脉络尚未脱离宏观叙事与规范分析，相对匮乏的实证研究又因缺乏合理的理论框架而不能对政治实践层面作出合理阐释。

（二）国外研究

国外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资本治理与民主转型的研究由来已久，在知识传承与经验延续基础上，已然形成了一些成熟的理论范式和思想流派，并在知识背景变换和世界视野拓展的主观和客观要求下，对于两者关系的认知始终处于肯定——批判——再肯定——再批判的理路之中。

1. 主要的理论范式

（1）古典学派及其发展

资本与民主的关系一直是西方近代以来学术文本经常涉及的基本主题之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还是自由主义的资本发展理论都对此有着细致的论述。两大学派都摒弃了传统的思维模式，认定资本成长对于现代国家建设的制度和主体意义，一方面资本治理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资本治理又诞生了现代国家民主所赖以依靠的现代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阶级立场、哲学判断和经验累积的分野，自由主义学派或否定国家之阶级特性或对之避而不谈，他们主张资本在民主进程中之主导作用以及国家的中立性，资本通过民主制度渠道影响国家的政策，民主制度又重塑资本和市场体系。马克思及其后继的思想家揭去资本“温情脉脉的面纱”，直指资本内在的逻辑结构，资本生产本身就是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过程，此种生产方式一旦成为国家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便成为资本的代理人，资本上升为国家的统治力量，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也必然具有阶级剥削之特性。^③古典理论主要以早期现代西方国家的发展为视阈，通过对历史演进之规律和社会经济结构之分化的分析进行事实归纳与逻辑推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结构意识，换言之，在历史结构的深处把握政治实践的

① 倪炎元：《东亚威权政体之转型》，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② 王振寰：《台湾的政治转型与反对运动》，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卷1期）1989年春季号。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6页。

价值和路径取向。此属于结构论的分析范畴。

后世的学者承袭了古典学派关于资本与民主的经典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如巴林顿·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针对资本治理可能性的条件进行比较分析，并勾勒出三种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对于作者而言，民主只有一条康庄大道，即资产阶级主治的民主。^①另一位当代资产阶级作家福山对资本和民主之间的紧密关系更是深信不疑，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认为，随着苏联、东欧解体并采纳资本主义制度，注定所有国家都会变成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国家，此种自信不仅源于其对历史发展脉络的认知，而且也是其知识建构的唯理主义所致。^②新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在反思经典的理论界说，他们一方面深知资本制度带来的种种弊端，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又肯定资本在过渡时期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资本是无法绕开的高墙。基于此种深刻的认知，他们在汲取马克思知识资源时各有所重、各取所需，在批判资本的同时期望“超越资本”，有的主张一种渐进的、和平的和折中的资本发展方案；有的批判资本统治的不道德，主张“通过一种向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的能承受的转变”，从全球资本制度的迷茫中找到一条出路。^③除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资本的批判外，美国一些主流学派也开始对“民主与资本主义需要彼此才能生存”提出质疑。^④鲍尔斯和金蒂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和民主不是两种互补的体系。”^⑤

(2) 经验主义理论

当代西方学界对于资本与民主的分析转向以发展中国家为背景，新的实践场域在不断挑战传统学说的合理性，“当代问题意识”重申着发展的多样性和能动性。学者们基本采取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深入到不同国家或地区如迷思般的政治实践中，他们的身上固然渗透着古典思想家的影子，却通过方法论的不断创新推动知识更新和制度转换，即对于资本与民主的分析不再简单停留在结构论和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内，而是更加注意民主化过程中资本相关者切实的分析研究，包括对涉及资本的战略互动和制度选择进行深入探讨。当然，此种研究尤为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性”，因而逐渐摆脱了以西方为基准的单线发展理论和意识形态局限的狭隘的经验主义思维。

① [美]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②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英] 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美] 帕特里夏·科恩：《令人意外的一对：自由市场与自由》，载美国《纽约时报》2007年6月14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7年6月20日。

⑤ [美] 塞缪尔·鲍金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和资本主义》，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①新“左派”的理论贡献

新“左派”的理论渊源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他们利用该分析工具对“第三波”民主化作出了独特的分析研究。如哈姆兹·阿利维认为，大部分后殖民地国家民主转型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单一的统治阶级，与早期工业化国家相比，后殖民社会的统治阶级往往是由分散的、竞争的和分裂的不同阶级组合而成的，一般包括国内资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土地阶级。正是这种分裂，使得一个具备中间色彩的组合应运而生，即军队—官僚组合。军队—官僚精英发挥作用，就需要这些分裂的统治阶级支付一定的资金。换言之，军队—官僚寡头统治逐渐独立于统治阶层而行使政治权力。^① 由于军队—官僚和分裂的统治阶级之间的互补和合作，从而阻碍了民主化的进行。由于当时作者所关注的巴基斯坦尚未开启民主化的议程，因而未能对民主化过程中分裂阶级与军队—官僚精英关系的变化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阿尔杜塞的学生普兰查斯则对“第三波民主化”的领头羊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民主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在这三个国家中国内资产阶级在推翻威权体制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由于国内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逐渐疏远而与买办资产阶级靠近，而且最终仰赖于后者，但国内资产阶级在推动民主转型过程中将自身与大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联为一体。当然，普兰查斯并不认为这意味着向“民族独立”发展（即从国际资产阶级体系中独立出来），而只是国内资产阶级、外国资本和买办资产阶级关系的重新安排，从而帮助了国内资产阶级，但仍然处于与买办资产阶级支配地位的长期谈判过程中。国内资产阶级更有可能推动政治变迁，由于其获取政治信誉的欲望以及更贴近经济现实，允许合法的工人对话者与之进行谈判。国内资产阶级对推动工业化非常感兴趣，由于先前的结构缺陷，要求工人利益有效地组织表达。普兰查斯主张，企业部门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希望能够获得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以反对“买办资产阶级”集团。其结果增强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地位，普兰查斯认为此过程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② 普兰查斯继承了其师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但在此基础上对不同阶级之间关系的分析也渗入了策略分析和联盟分析的因素，从而对于民主化研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②依附论视阈中的资本与民主

依附理论认为，第三世界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容，其有两个基本的假设：第一，资本主义外围的本质决定了该国可能实施的经济战略，此种战略往往造成财富和收入的高度倾斜以及统治精英和大众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此巨大的社会鸿

^① Hamza Alavi, "The State in Post-Colonial Societies", in *New Left Review* 74 (1972); Hamza Alavi, "Class and State in Pakistan", in *Marxian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Edited by D. Banerjee, New Delhi: Sage, 1985.

^② Nicos Ar.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Verso, 1973.

沟阻碍了民主统治的可能性。此外,第三世界威权体制经常需要通过强力维持资本主义秩序。第二,资本主义外围的本质预设了国际资本主义会参与到当地经济中,从而造成本国资本主义合法性的丧失。因为后者似乎是为外国利益而不是本国利益服务。^①可见,依附理论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地位的基础上,二者形成了一种“中心—外围”关系,^②其实质源于国际分工不同,即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基础资源的供应国,而发达国家则将其工业品向发展中国家倾销。进而言之,这是一种不平等的资本交换体系的产物。国外资本主导主权国家的发展,而后的资本仅处于初级产品阶段。^③由此必然反映到政治形态上,致使依附性的国家严重缺乏自主性,只能依靠威权体制进行强势统治。

依附理论能够部分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和威权统治形态,至于其对民主转型的作用则趋向两种相悖理论,一端为阻碍民主转型,一端为促进民主转型。其实,依附型威权体制的政治转型要端视其他一些因素而定,如依附的程度、依附者的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在国际战略中的重要性等。有些学者就认为,对于某些依附国家或地区而言,依附能够促进该国或地区市场体系的建设、资本的初始积累和一个具有外向型的资本集团的产生,从而为该国或地区的民主化创造合理的经济基础和现代阶级,而且中心国家的民主制度和价值也能够为依附者所借鉴和习得,因而能够促进依附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化。^④

③发展型理论

发展型理论是对东亚工业化模式取得卓著成就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其基本观点是:政府通过有选择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政府有选择地对经济进行微观干预,经济的发展和赶超是通过政府支持战略性产业而完成的。^⑤其他学者如阿姆斯特登、韦德、埃文斯、维斯、霍布森等则将该理论进一步丰富和深化。^⑥从资本治理的角度看,发展型理论涉及威权体制下资本的积累和发展,以及政治体系和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一,政治权威主导资本治理,资本的积累和发展战略是通过政治的安排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威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第二,政治之所以能够对资本进行配置在于国家的自主性和权威性,自主性是指国家能够独立于资本集团做出决策,权威性则是指国家的威权特征,能够通过军队—官僚体系对资本形成震慑力;第三,资本与政府形成了一种权威的合作主义模式,“紧密

① David Becker,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Dependency in Latin American”,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6, no. 2, (April 1984).

②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④ Anek Laothamatas, ed.,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⑤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 - 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⑥ 参见朱天飏:《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219页。

的工业联系是建立在官僚精英与私人企业相互协商和合作的基础上”；^① 第四，在政府和资本相互合作的过程中，政府和资本也在进行相互授权，资本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第五，将劳工和其他社会力量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发展型理论内含着威权统治的要素，亦将资本治理置于威权体制之下，一方面资本治理构成了威权体制的次级体系，另一方面资本主体又成为威权体制的支持力量。发展型理论更多涉及资本的经济层面，而对于其政治形态和民主转型则鲜有论述，但是该理论运用比较政治经济分析，对于民主化和资本治理的研究有相当的镜鉴作用，而且该理论主要是以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对于我们的课题助益颇多。

2. 典型的案例研究

除了上述成型的理论范式，不少文献以国别或区域（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和案例研究对威权体制下的资本治理与民主转型的关系进行阐释，其中不乏精彩的论述并构成了知识积累的基础内容。

（1）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与资本治理

正如前述所引林兹的观点，西班牙在佛朗哥政权下，利用资本主义成功地改革了经济和社会，商业获得了相对的特权地位，特别是它的某些对手被限制自由组织。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商业会成为民主化过程的敌人，而且，在反商业运动的压力下，政党和自由贸易联盟会动员工人阶级转而反对民主转型。但是马丁内兹（Martinez）在《西班牙的商业与民主》中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即资本及资本精英的实用主义对成功的民主转型具有特殊的意义转换功能。他认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商业部门控制了资本和一定的组织，必然在政治体系里有着关键性要求。商业支持的拒绝导致民主失败的可能性甚于其他部门的力量。他进一步指出，西班牙经济精英的支持是民主转型成功的关键。在尝试将一个现代的、工业的和市场取向的国家如西班牙予以民主化的过程中，商业社团的作用，通过其集体利益组织和个别企业决策的集中，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商业控制着资本，它们代表了该体系内相当的力量。如果市场体系中的商业社团信心丧失则会从根本上导致潜在的限制、崩溃或巩固的失败。多数人支持的政府政策，如果造成信誉丧失和资本逃逸，对新兴的民主必然构成威胁。^② 马丁内兹主要是通过对西班牙的资本精英进行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得出这一结论的，因而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不过，他的研究很少涉及西班牙作为欧陆体系之一部分传承了成熟的资本治理体系，因而具有得天独厚的被示范条件和文化基础，而且，他的研究对资本与政治、资本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涉猎甚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论证的力度。

^① Ziya ōniJHJ, Review: "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4, No. 1. (Oct., 1991)

^② Robert Martinez, *Business and Democracy in Spain*,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3, p. 135.

(2) 智利的个案研究

希尔瓦 (Silva) 分析了资本在智利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他将威权时期的智利分为三个时期: 渐进时期、激进时期和实用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在这三个时期里, 国内主要的政治力量, 如资本精英与土地精英之间的同盟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 资本和国家的互动成为智利新民主的经济社会政策制定的中心特征。为何资本会反对威权体制而支持民主转型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作者认为, 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组合的产物: 一是被排斥于经济政策制定之外, 资本作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却被隔绝于政治过程之外; 二是威权体制下的经济运行差, 经济停滞、通货膨胀、贫富悬殊, 其后果是社会经济秩序崩溃; 三是来自顶层威胁的弱化, 即威权统治者对资本已经难以做出强制的威胁。^① 希尔瓦通过对智利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 对资本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 (主要是土地精英和劳工阶层) 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案例研究。当然, 作者可能偏于其分析的视角未能对资本制度体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3) 突尼斯的案例研究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 民主政权崩溃、威权统治复兴似乎成为常规, 突尼斯即为典型的案例。然而, 有组织的劳工, 作为突尼斯长期的政治积极者和反对派, 却毫无怨言地站在威权统治一边。而大工业、私有部门的领导者, 他们的利益被假定在可预期的、负责任的政府中获得发展, 也没有表现出对政体堕入威权统治有丝毫异议。资本与劳工对民主政权的崩溃的反应让人不解。贝林认为此种现象在两个方面是反常的: 首先, 它超越了理论预期的层面, 即政治经济长期的传统引导我们期望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主角成为民主化的主体, 而不是威权主义的盟友。其次, 自从突尼斯独立以来, 资本和劳工与国家关系的历史轨迹被颠覆。资本和劳工获得了足够的权力, 使之能够促进民主政府。^② 为何会出现此种反常现象呢? 贝林认为国家扶植的资产阶级工业化并不必然导向民主, 尽管这经常造成威权国家自主性的下降。资本和劳工可以推动国家的反应, 但仅仅是为了关注他们自身的物质利益。因而利益的界定成为问题的关键。早期工业化国家的资本和劳工面临意识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 这些条件促使他们与绝对主义国家冲突而与大众利益结盟。后来的阶级享受到国家扶植的好处, 没有挑战国家和与无特权群众结盟的利益取向。强大的物质利益造成了民主发展停滞不前。^③ 作者对突尼斯反常现象的分析, 紧紧抓住“利益”这一关键因素, 可以说为资本治理与民主转型的分析提供了锐利的工具。但是, 只有利益因素在起作用吗? 制度方面能否解释此种现象呢? 还有其他因素在

① Eduardo Silva, *The State and Capital in Chil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6, p. 24.

② Eva Bellin, *Stalled Democracy: Capital, Labor, and the Paradox of State - Sponsored Development*,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 - 3.

③ Eva Bellin, *Stalled Democracy: Capital, Labor, and the Paradox of State - Sponsored Development*,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